

日本政治学动向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

〔日〕神岛二郎等著

商 务 印 书 馆

日本政治学动向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

〔日〕神岛二郎 等著

马 斌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行動論以後の政治學

据日本《政治学会年报,1976年》岩波书店版译出

日本政治學动向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

〔日〕神島二郎 等著

马 斌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334

198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75千

印数 7,500册 印张 11 5/8

定价：1.45 元

译者说明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是日本政治学会出版的《政治学会年报，1976年》的一个特辑。这里译出的有其中的一篇绪言和九篇论文。原书还附有《学会报告要点》、《日本政治学会年录（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日本政治学会会计报告》、《日本政治学会章程》等材料，因篇幅所限，故省略。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学流派，亦是所谓“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六十年代，它在美国风行一时，并逐步占据了政治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它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区别在于：从内容上说，不是以国家机构、典章制度，而是以人们的政治行为，如政党、团体和个人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从方法论上说，主要是通过数学统计和模式以及运用心理学方法来进行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之所以首先出现在美国，就是因为在美国现代计算技术最发达，那里可以得到大量数据。同时，行为主义政治学对人们投票行为的研究，也受到美国资产阶级政客的重视，并得到垄断财团在财政上的大力资助。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也伴随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主义学派是维护现状派，只说明现实而不指出怎样去变革它，是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尽管在可能的情况下，作数量研究是必要的，但由此作出准确的计算是不容易的，耗资数以万计得出的结论却微不足道。民意测验的结果也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论。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实用性”，在美国越来越受到怀

6.25.77

疑。

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六十年代末，在美国又掀起了一个所谓“后行为主义革命”。1969年，当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D. 伊斯顿，在政治学会的年度大会上宣布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终结，同时展望了“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伊斯顿指出后行为主义革命的基本目标有三点：一、优先进行应用研究；二、在基础研究方面推进对社会更有意义的研究；三、加强价值理论的研究。当然，这种所谓“后行为主义革命”并不是从根本上脱离行为主义，正象所谓“后凯恩斯主义”并不从根本上脱离凯恩斯主义一样，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其某一学说遇到危机时采取的一种变通说法。

日本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或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在战后从美国引进的。它在日本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占据主导地位。而日本提出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也与美国的含义有所不同。在美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核心是解决所谓“实用性”的问题。在日本，则是指克服历来引进外国学术的传统，使“行为主义政治学”变成真正日本的东西，即立足于日本的现实，提出适合于日本自己的理论模式。本书的几篇论文，就是日本学者朝这方面努力的部分成果。

不消说，任何资产阶级政治学，都是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来研究政治的。行为主义或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当然也不例外。我们翻译本书的目的，是想向我国政治学界介绍一点国外政治学研究的动向，以了解当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现状。很明显，不管是“行为主义政治学”还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我们都应当象对待其它任何资产阶级学说一样，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包括对于它所使用的某些方法。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北京大学历史系马斌同志(第二、三、四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赵友琦同志(第一、八、九篇)；北京大

学亚非研究所任清玉同志(绪言、第六篇);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王汉昌同志(第七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赵晨同志(第五篇)。本书绪言和一、五、八、九章由马斌同志校阅过。

由于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各种流派接触甚少,对其使用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很不熟悉,再加上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篇 磁场政治学.....	神岛二郎(10)
第二篇 运动政治学.....	高畠通敏(37)
第三篇 事件政治学.....	樋口 谨一(67)
第四篇 语言政治学.....	栗原彬(96)
第五篇 和平政治学.....	关宽治(141)
第六篇 第三世界政治学(I)	森利一(185)
第七篇 第三世界政治学(II)	武者小路公秀(238)
第八篇 政治人类学.....	前田康博(269)
第九篇 后行为主义的计量政治学.....	山本吉宣(299)
附 录 日本政治学界展望.....	日本政治学会 文献委员会(331)

绪 言

战后，丸山真男首先对明治以来的传统政治学进行了批判，提出“科学政治学”^①的问题，并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他的《政治世界》^②一书被公认为我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先驱^③。

丸山试图从政治思想史的领域分析日本政治的现实，并且取得划时期的业绩，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是从这里去建立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式，所以，从这点来说，他本应试图从日本政治现实中提取认识范畴，然而，无论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没有这样做，而是援引欧美的政治学理论（例如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列宁、韦伯、拉斯基、柯尔、米切尔斯、施密特、梅里亚姆、摩根索、拉斯韦尔等）并基本上用他们的理论作依据。因此可以说，他是对这些理论进行重新整理，并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而建立起自己独特学说的。

我国原有的传统政治学，本是从宪法论中分化出来的。在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中，虽然并不是没有其它系统的政治理论，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在传统政治学中，主要的倾向是对机

① 日本《人文》杂志第2号，1947年。

② 御茶水书房，1952年版。

③ 当然，我认为也不能忽略开始进行行为研究行为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实态调查，以及战后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辻清明。

膳山正道对丸山的批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写了《日本近代政治学的发展》（实业之日本社，1947年版）一书，也是很有名的。接着他还出版了《近代国家论》三部（弘文堂，1950—1952年版）；另一方面，正如他编写《农村自治的变化》（农业综合研究刊行会，1948年版）和《政治意识的解剖》（朝日新闻社，1950年版）等那样，还致力于实态调查。在这些方面，辻和中村哲两人都参加了。虽说是实态调查，但在关心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上，他们都接近于传统的政治学，很难说是他们确立了行为主义的方向。

构及其运动进行解释,并且仅限于按照“理论与实践”这样的论述范畴,专来探讨欧美制度移植的由来和新制度的引进,进而追溯到欧美制度形成的由来及其思想背景。当时主要关心的与其说是从我们的政治现实中提取认识的范畴,——在这种政治现实中,只要我们自己想直接获取经验的资料,那就一定能够获得,——并且以此为杠杆建立新的政治学理论,不如说是以引进和移植新制度为杠杆去指导政治和进行政治变革。

战败后,明治宪法体制崩溃,由此产生了新的情况。人们根据这种新的变动,提出了重建政治学理论的课题。这时,代替原有的机构论而出现的是权力论。前面提到的丸山真男的政治学,正是想从正面对政治状况论及政治权力论等当时关心的问题作出回答。

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引进,随着初期阶段的结束而日趋完备。计量方法的采用是第二代人所作的尝试。当然,在计量方法的引进上,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为早,政治学在这方面是落后了。这是因为我国学术体制上,政治学是同法学结合在一起的,它同法学及历史学、哲学的关系很密切,而在研究训练方面则与数学的关系较远。当然,研究政治并非必须从学术体制上研究政治学,即使在政治学以外的学术领域,也要进行政治行为的研究。因此,这种研究就带有跨学科的倾向。这决不是一件坏事。相反,人们注意到,理论模式的问题正是在这点上才必然成为重要的问题。

但是,无须赘言,计量方法是在统计学中发展起来的。用抽样法抽出样本,或处理从已有的资料中得到的定性资料,进行多变量解析——重回归,重相关,偏相关,判别分析,成份分析等。除此之外,我国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把所处理的定性资料进行数量化分析,所以数量化理论已由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的林知己夫提

出来,并由京极纯一引进了政治学,并使之作为一种方法而发展起来。

在政治中,接近计量研究的是选举。研究分为事前预测和事后分析。前者有林知己夫和日本广播协会,后者有京极和高岛通敏等,他们不断取得成果,在研究方法上也前进了一步。

在政治意识的研究方面,统计数理研究所自1953年以后,每隔五年便用同一题目在全国进行反复调查。这种全民性的调查可以比作为气象观测中的定点观测,不仅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不仅在日本,而且在同其它国家的比较中,能够显示时间变化的特性,这一点则为人们所注意。京极与池内合作并参加以巴贝尔为负责人的国际比较调查项目,取得显著成绩。三宅一郎用数量化理论曾对京都府宇治市的舆论调查资料进行彻底的分析,他在利用电子计算机处理舆论调查资料时,设计前发表了一种有用的通用程序,目前正在努力提高研究水平,也很引人注目。京极还得到外务省的合作,试图进行国力的比较研究,目前正在方法上进行考虑。此外,在国际政治方面,猪口孝试图用数量化理论进行国际关系的分析,关宽治试图用结构模式建立模拟模式。

然而,在我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的则是京极纯一。当然,同它齐名的林知己夫的作用也很大。因此可以说,是他们奠定了日本行为主义政治学计量方法的基础。

京极在《现代政治学的问题与方法》(《年报·社会心理学》第二号,1961年10月)一文中提出,要从社会情况的解说中寻求政治学的课题,他把理论方法区分为传统的方法和行为主义的方法,对于理解模式,则强调整控制论(Black box)模式的必要性。他断言“只要政治学的躯体中有‘两个灵魂’,那就不能阻止控制论模式的发展。这是因为控制论模式不仅是对研究者关心知识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关心实践的反应。‘树因果实而知名’。今天控制论模式

的问题,就在于能够使其结成果实的经费和人员的‘补充’上。”京极还结合着下面这些话:“今天的政治学,正在摆脱政治哲学、政治机构论、政治史三位一体所表现的古典的终结性。它是如何并向哪里发展?在其背后的推动力又是什么?这已显示出它本身的形象。政治学这座繁华的大厦,我们对它是有所了解吗?”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信心。接着,他在《关于政治形象的测定》(《东京大学教学部社会科学纪要》第十二辑,1963年5月)中提出了新的方法。文章结尾部分在展望未来时谈到:“如果进行一定的刺激,长年累月反复分析某个特性集团的反应,就可以得到相当于定点观测的资料和政治史上的基本资料。如果对于各地各个集团广泛进行,就会得到象各地气象站所报告的气候状况那样的观测结果,就有可能从业余爱好者的“观天望气”中出现学术上的‘预测’”。这样,不仅是引进,而且发明了新的计量方法,并且随着电子计算机化,为走向宽广的科学之路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全部政治过程的理论模式,则被冈义达、永井阳之助、京极、石田雄等参照自动控制通讯系统,经过摸索而揭示出来^①。

最早开辟通向行为主义政治学道路的丸山真男,在第二代人开始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时候,他反而回到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上来,尽管在思想史研究上发表了《历史意识的古层》(《日本的思想》6,《历史思想集》,筑摩书房,1972年)那样具有独特见解的大作,但在政治学理论的建树上,似乎并未能使自己已有的成就继续深化。一般认为,这恐怕是由于他那已有的成就本身并不是从现实基础中抽取认识范畴而获得的原故。这一点,即使就第二代人所提出的理论模式来说,多少也是适宜的。因此必须指

^① 参照冈:《权力的循环与象征的选择》(《国家学会杂志》第66卷,第11、12号);永井:《认识的象征与组织化的象征》(《思想》第383号,1956年5月);京极:《领导与象征过程》(《思想》第389号,1956年11月);石田:《组织过程与象征过程》(上、下)(《思想》第420、422号,1959年6月、8月号)。

出，这些调查对于能否适用于现实都还存在很大距离。这不仅在我国，即使在美国，情况虽有所不同，也是行为主义政治学面临的一大难题。战后我国最早提出问题的丸山真男“具有一种强烈的愿望^①，他最关心的是想恢复伊斯顿所说的‘政治学的有用性’(relevance)”，从这里也可知道，一方面认识的范畴必须从现实中抽取，但另一方面，政治的论述，如果从同时既存的政治体制中排除独立的愿望，恐怕也就无从谈起了。这就启发人们要求学术不要大型化，而要走小型化的道路。

我们这次虽然出版了这本称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特辑，但是，这里所说的“后行为主义”，不是象一味引进美国的行为主义那样，根据那种流派而引进后行为主义的，而是一面立足于我国通过引进行为主义而取得的成就，一面从本国的现实中寻求认识范畴，以此来克服那种依赖外来东西的传统。

我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从前面提到的《政治世界》开始的。在那部著作里，从政治状况一直谈到政治权力，但当时是把政治状况看作围绕纠纷及其解决的一种循环，当认为纠纷激化而且出现政治色彩加强的情况时，权力就来左右状况。虽然认为纠纷激化，但只把纠纷极端化看作是脱离了政治，而在极端化之前仍承认它是政治。这的确是一种巧妙的立论。不过，尽管由于人的内心出自受惊的波澜带来了混乱，但由此产生的潮流不久就会为新的“统一”作好准备。这种事实，大概不能说它不是政治。如果是这样，那么以纠纷的斗争化为前提来普遍考虑政治状况，这是否妥当？我们不妨那样来考虑政治状况，因为实际上，这仅限于意外的场合。那么这样的条件是什么呢？这是首先需要提出的问题。

^① 福岛新吾：《政治学的课题——战后近三十年》《专修法学论集》第22号，1976年3月，第55页。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PSR, 63, 1969, -pp. 1051-1061.

照我想来，这可能就是指被引到所谓政治权力这样一种政治概念中。而这种政治概念是以行使暴力为不可缺少的前提的。所谓政治，并不是那种专以行使暴力为前提的东西，而是在个体同集体的力学(dynamics)对比中形成起来的“统一”的机能。如果承认人们之间形成一定的“统一”就是政治，那么就不应当认为行使暴力是唯一绝对的前提。因此，政治“统一”的原理并不是单数，而是一个复数。而且政治状况是按照各个“统一”的原理，并通过各种原理交织一起而表现出来的。

但是，在政治状况中有其固定的程序。这是因为在基本政治状况中，政治的磁场在起作用。磁场的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的。一般认为各种不同的形态是由政治社会的舞台装置决定的。这就是提出磁场政治学的原因。

可是，政治状况就是日语中所说的“事”，它是围绕着事件而发生的。所谓事件，就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相遇”，它暴露出世界的破绽，并想把不同的世界相互联系起来。这就是必须提出事件政治学的原因。因此，我们在用“事”(事件)这一概念来分析一切政治事件的时候，不禁要问将会出现怎样的情景？

不言而喻，社会是由多数个体构成的。正因它是个体构成的，所以社会才不可避免地形成状况。可是，另一方面，假如没有个体中产生的自由活动，社会也就不能“统一”。这就是必须提出运动政治学的原因。因此，我们若用所谓“运动”来分析一切政治现象，那将出现怎样的情形呢？

政治往往容易被强调为非日常性的，但是并非如此。政治与“事”有关，而且还涉及到“语言”。这是因为通过语言可以扩大政治影响的范围。因此，我们不仅要探讨政治的语言性，而且还要了解语言的政治性。这就是必须研究语言政治学的缘故。

语言能使人结合或者分离。这种分离结合的作用，其本身就

是政治。这就是说,政治未必都是以暴力、抗争为前提的。如果不一一定要以暴力和抗争为前提,那么和平就不仅仅是力量的均衡与抗争的冻结,而它所追求的应当是超越这些的价值和实践。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存在一种相应的技能和手段。这就是必须提出和平政治学的原因。

在近代国际政治中,所谓的先进列强,一味推行强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承这种潮流的超级大国,逐步达到强权政治的极限。相反,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开始产生新的影响。这恰好就在先进国家中出现一种要求改革的运动,它针对旧有的文明,追求一种取代它的新价值。这种改革运动与开始到东方的神秘世界和历来所谓的“未开化”民及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人的世界去旅行一样,我认为这里也包含着对政治学提出的新问题。这就是第三世界政治学必须提出的原因。

自发现新大陆以后,随着欧洲世界的扩大,落后的社会以及未开化的野蛮民族饱受压迫、残遭灭绝或处于从属地位的世界,其有关民族志的情报,对形成欧美近代政治学所起的影响之大是难以估计的。但是,这在我国的学术界,除极少数例外,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知道。当我们探讨欧美政治文化传统的性质,开始重新发现与其性质不同的民俗文化政治学普遍适合性的时候,政治人类学必须通过我们来加以总结和重新建立起来。

自计量政治学建立以来,对它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尽管如此,它还是发展起来了。其间被遗忘的,或是作为自我反省而提出来的是什么呢?为确定政治学的新方向而探讨这些方面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还有,当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想谈谈下面几个需要共同留意的地方。

第一,我们应把重点放在这一方面:即尽量以我们自己能够直

接观察,并且可以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地方——日本的现实为线索,由我们自己提出新的理论模式。

第二,应认识那时日语的效用并考虑把它作为有力的手段。因为这与最近的日语论的热潮无关,而同政治语言的关系才是最根本的。

我们在“磁场政治学”中,把社会区分为异成社会和驯成社会。但从整体上讲,这些都是因政治实质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强制异化的异成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人、物、语言等等,都拒绝从外面进入,而对外出却不予过问。相反,在强制驯化的社会里,却欢迎来自外界的东西,而对外出的一切则有追回的倾向。与此同理,异成社会的政治,使语言发生分化和纯粹化而形成一种异成语;驯成社会的政治,则使语言混杂而形成一种驯成语。随着社会民主化,下层就模仿上层,称之为模仿威望。在这种情况下,下层是追赶,而上层是逃避。但是,在异成社会和驯成社会里,上层逃避的方法却不一样。在异成社会里是使母语分化,相反,在驯成社会里却是混用外来语。因此,从政治方面来说能够接近语言,从语言方面来说也能够接近政治,但不可忘记,特别把处于对应关系的情况看作是适宜的,这只是就政治的基调而言,而关于基调以外者,就不需要处于对应关系的情况。一般来说,两者都是正常的。

但是,同印欧语系语言相反,印欧语系语言是异成语,日语却是驯成语。同样,欧美社会多是异成社会,相反,日本社会则是驯成社会。欧美的政治学,以异成的印欧语系各种语言为手段建立起理论模式。因此,我们要想克服依靠进口的理论模式的传统,那就可以并且应该从异成语的对立面驯成语的日语方面得到有力的帮助。

第三,我们虽说把日本的现实和日语作为手段而创造认识范畴,但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同时探索在欧美及其它地区是否可以

发现同样的手段,以便通过这些手段尽量获得普遍适宜的根据。

但是,这些都是在必要和可能情况下来做的,而不是说,在任何场合一概如此。这是因为在主题的性质上也有几乎不能考虑的情况。然而,无论如何,倾注全力在理论上开拓新的展望这一点则是共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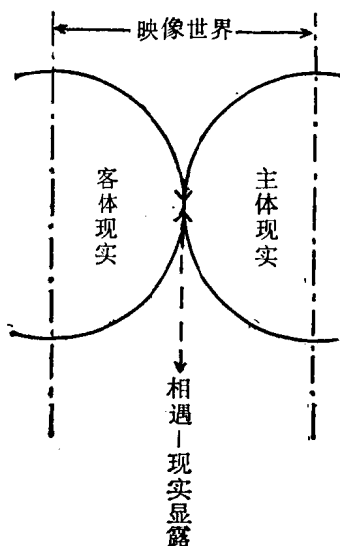
最后,必须提请注意的一点是,有些题目虽在本特辑的筹划与共同研究的阶段提出过,但最后却被删掉或变更了,例如日常性的政治学、自我恢复的政治学、联系的政治学、政治史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

第一篇 磁场政治学

神岛二郎

—

映象与现实 现实是在主体与客体“相遇”中显露自己的。但实际上,由于现实显露时只是采取主体与客体“相遇”的形态,所以未必可以说现实是由主体与客体构成的。在以主体与客体“相遇”形态下所看到的现实,实际上是映象世界。现实本身应该是一个



图一

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的整体,不,甚至还不能说一个整体,而只能说是一片黑暗,是个无明世界。

即使认为是无明世界,我们也还必须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所以要通过与现实的“相遇”尽可能构成符合于现实的映象世界。映象世界必须符合现实,但其本身却是同现实世界根本不同的。

我们经常是通过映象作用于现实的。如果映象脱离现实,那么就会与现实冲突,并通过这种冲突同现实“相遇”;如果映象正好符合现实,那就与现实不发生

冲突,而一直反映在映象之中。